

# “假证母亲”背后的真实困境

## ——一个在京务工家庭的求学风波

本报实习生 吕佳音 文/图

8月19日晚8点,北京昌平区霍营城铁轻轨高架桥下的群租院内,有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屋内简陋,潮湿,大衣柜将空间隔成卧室和客厅,摆放着一个四口之家的简易家当。屋外炉灶上,米饭在锅里温着,李刚站在门口等待妻子韩美丽输液归来,6岁的儿子军军在一旁无忧无虑地玩耍。

为军人学而办假证,韩美丽被民警抓获,拘留了7天。自8月16日被取保候审,至今又近一周时间过去了,韩美丽已经回冷厂上班,但她仍然如同惊弓之鸟,惶恐的情绪和巨大的压力让她终于病倒,体力不支而去就医。

此时,李刚脸上的笑容却比3天前笔者初次到访时多了些,虽然仍在等待最终的结果,妻子毕竟暂时回来了,“总算长舒了口气,家里有她才有家样儿啊”,他甚至很高兴地对笔者说,“最近关心我们的好心人特别多,有人给孩子介绍了一家民办学校,可我们铁了心要上公立学校,哪怕夫妻分居,一个人陪孩子回山东老家,也要让他上公立学校。还有一位好心人帮我们联系了丰台区的学校,不过离工作单位很远,确实有困难。但无论如何,特别感谢大家,真的很感动!”

韩美丽,这位平凡的打工母亲和她的家庭因为“假证风波”成为最近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这样的名人我们也不想解决!”李刚无奈地苦笑。

### “五证”不齐无奈造假

8月9日,韩美丽在购买伪造公章时,被昌平区回龙观龙园派出所的民警当场抓获,进了拘留所。

8月16日下午,笔者第一次来到韩美丽家中时,李刚正在闷闷不乐地等消息,束手无策。“完全顾不上孩子上学的事了,满脑子都是我妻子的事,什么时候会有新进展,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她,她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可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事情追溯到5月,如同此前媒体报道的那样,夫妇俩着手为儿子办理入读公立小学所需要的“五证”,5月底,来回跑了四五次的夫妇俩拿着认为齐全的“五证”去街道办,却被告知暂住证时限不够6个月的要求,并且在山东老家开具的无监护证明手写不合格,借读证明没有办下来。

“刚开始去街道办,问具体怎么办,工作人员就指着门口贴的通知,让我们自己琢磨,什么格式、怎么写都一头雾水。凑齐这‘五证’太难了!在京居住证明是用妻子的同事好心借我们的房产证办的。社保证明要两个人的,孩子他妈有,我一直在打零工,说实在的,家里开销哪里还够我再交一份社保啊?无监护人证明是催着老家孩子舅舅赶紧跑着办的,结果却说手写不合格。”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李刚仍然觉得很狼狈,“交材料的时间就快到了,这么多问题都没解决,都要急死了。”

眼看提交材料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如果错过了申请时间,孩子今年便不能入学了,夫妻俩心急如焚地回家后,烦躁地吵了一架,之后的几天,李刚便暂时不理睬这件事,内向的韩美丽嘴上不说,却绞尽脑汁地想解决办法。8月初,偶然看到街边墙上办假证的小广告,无奈的她一时脑热,便冲动之下做了错事。

### 只为上一所公立学校

费劲周折的夫妇俩为何只选择北京公立学校?李刚向笔者道出了其中的缘由:上公立学校是经历女儿上学的艰辛后,夫妇俩为儿子做出的坚定选择。

他们的大女儿珍珠4岁时得了银屑病,为了给女儿治病,一家人来京已经有十余年了。由于经济原因和外地户口受限,女儿的大学和初中都是在条件不太好的民办学校就读的。珍珠初二时,夫妻俩得知,将来学校只能安排学生们考人职高,为了能入读普通高中,夫妇俩不得不让女儿回山东老家。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京上学期间,女儿遭遇学校被拆、频繁换学校、教材与公立学校不同步等问题,学习环境始终不够稳定,没有保障。

这些问题夫妇俩看在眼里,便暗暗下定决心,儿子不能再这样重蹈覆辙,“一定要上有保障的公立学校,这是铁了心了,说实话女儿的学业已经耽搁了不少,我们已经很愧疚了,不能再让小的(孩子)学业再不顺了。”

离出租屋不到两公里的霍营小学是一家人最理想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夫妻俩努力争取着,没想到一开始便受挫,更没想到陷入了这么严重的困境,“就像过关一样!先办‘五证’,接着办借读证、报学校、入学名额。即使上了学,还有初中、高中……过了这关还愁下一关,我们外地孩子在北京想上个有保障的学校,难啊!孩子妈的事情发生后,好多人同情、关心我们,很感激。也有人说我们外地人争教育资源还做违法的事,被抓了活该,我真的感觉很无助。”看着儿子在一旁无忧无虑地玩耍,李刚的心中五味杂陈。

### 求学困境远非个案

8月16日深夜11点,韩美丽的代理律师突然接到警方的电话,通知去接人。李刚听闻立即打车赶到昌平区看守所,签署了取保候审手续后和儿女一起将韩美丽接回了家。



在这个小屋内,一家四口又团聚了。军军晚上终于不会再哭着要妈妈了。李刚的眉头终于稍稍舒展了一些。虽然在采访中,韩美丽说过丈夫不爱做家务比较懒,但是事情发生之后,李刚却显示出他细心的一面,在一些媒体前来采访的时候,他总是保护着受到惊吓的妻子,替她回答问题,尽量避免过多询问。

回到家中的韩美丽握着取保候审决定书痛哭了很久。“我们都是老实人,一直都本本分分。真的是法律意识淡薄,又着急为了孩子,才做了错事。”回想起整个事件前后经历的波折,韩美丽百感交集,“我后悔,但也觉得委屈,我不知道这是犯法,就想让孩子有个公立学校可以上,好点差点没关系,可是真的太难了。”韩美丽一家面临的困境并不是个案,由于求学无门,不少外来工家长不惜铤而走险“办假证”,这也是他们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

2011年,合肥葛天店小学将所有申请入学的家长资料拿到劳动部门查阅,竟然发现70%的合同是伪造的;同年,青岛市市南区外来工子女小学报名中,出现两份不同的营业

执照,地址却一模一样的荒唐事件;2012年8月,广东省江门市7名家长为孩子入学办虚假《计划生育审核证明》等证件被识破,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而城市街道上随处可见“办假证”的小广告,网络上各类“快速办理证件、诚信刻章”的网页层出不穷,仅需QQ号、手机号即可与之取得联系。办理证件种类繁多,几乎涵盖日常生活,价格数十元至数百元不等,几天内即可完成。

为子女上学而办假证的现象已然泛滥。外来工子女进入城市公立学校“门槛”过高、证明繁琐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再一次引发社会各界而热烈的讨论。

8月21日,在电话中,韩美丽的代理律师、北京凯泰律师事务所段吉胜律师向笔者介绍了案件的最新进展:“19日晚,警方向韩美丽和李刚进一步了解了有关情况。对于本案的定性尚不能得出明确结论,需等待公安机关定性通知。”

(为避免引起阅读混乱,本文中人物名字均沿用了此前有关媒体使用的化名)

# 一直都在“找组织”

## ——探访京城兼职工群体

本报实习生 杨召奎

在北京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大多20来岁,生性自由散漫,不喜欢被人束缚,他们没有高学历,没有一技之长,没有背景,只有结实的身板。他们从事的多是零零散散的兼职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可靠的保障。他们曾被人瞧不起,曾被人忽视,曾被人冷落。但为了生存,为了父母,为了“娶媳妇”,他们依然坚持留在北京这座熟悉而陌生的城市里。

### 兼职工作五花八门,基本没门槛

“招8月13日七夕情人节送花人员,每单15元,日结150-300元不等。要求:带身份证和签字笔。多劳多得,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踏实诚信,肯吃苦耐劳者优先……”8月12日晚9:22,一个名为“兼职北京群”的qq群发布了这样一条兼职信息。

“招医院排队挂号人员,工资日结90元,工作轻松活不累,玩手机,看报纸都行,无要求,有身份证就行,全天工作5小时左右。周一到周五天天用,工作轻松……”8月12日晚9:40,一个名为“北京招聘兼职交流群”的qq群发布了这样一条兼职信息。

据笔者了解,有这样一群人,没有固定的工作,主要通过兼职打工赚钱,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到哪里去,他们工作几乎是两天一小换,三天一大换,最短的甚至仅有三小时,最长的也不过一个月。一直在“找组织”,是他们的普遍状态。因为没有电脑,他们主要通过手机qq获取兼职信息。

在网络上,兼职qq群有很多,一般都冠以“兼职”两个字,每个群的人数从100人到800人不等。笔者试着加了几个兼职qq群后,很快就通过了qq群管理员的认证。随后,qq群的图标便闪烁不断,各类兼职信息纷至沓来。

这些招聘信息真可谓五花八门,不仅有兼职保安、群众演员、节目观众、“小蜜蜂”、发单员、情人节送花员,甚至还有上述招排队挂

号人员的。

这些兼职工作大多不要求学历和工作经历,主要靠出卖体力和耗时间赚钱,肯吃苦耐劳即可,基本没有门槛。而兼职保安的要求则相对高一些,一般要求男生身高172cm以上,穿黑色皮鞋。这些兼职工作,一般都是“工资日结”,但普遍不高,以兼职保安为例,一般工作8小时,工资日结,只有90元。据在北京做了两年兼职工作的小王说,最赚钱的莫过于“小蜜蜂”了。“小蜜蜂”是指婚博会的指引人员,只要将参加婚博会的游客带到商家指定的位置,就意味着做成了一单生意。

“如果积极卖力点的话,一天200元应该不成问题。”说到婚博会,小王有些兴奋,但他又有点遗憾地说,“但是婚博会一年才四次。”

### 没学历,没技能,不愿被管束

小王来自河北衡水一个贫穷落后的乡村,父母主要务农,农活不忙的时候,父母也会外出打工,但随着父母年龄的增大,作为长子的他,身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小王今年才21岁,但从他的外表、神情、说话的方式来看,让人觉得他很成熟,很干练。

“我高中毕业之后就出来打工,现在已经在外面干了5年了。”小王告诉笔者,他曾跟随老乡去过上海、南京、常州等南方城市打工,但因为老板管得严,工作太枯燥等原因,最后他只身一人来到了北京。

“听说北京赚钱机会多,而且离家比较近。”小王告诉笔者他选择来北京打工的初衷。北京赚钱的机会虽多,但对于小王这样没学历、没技能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生存的压力也很大。他告诉笔者,刚来北京的时候,别人介绍的工作不是保安就是酒店服务员,工资一般在2000元/月左右。

然而,小王已经厌倦了日复一日单调而乏味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不喜欢被人管束。”就是这样一理由,让小W做出了零零散散的兼职工作。

小王告诉笔者,他加了6个qq兼职群,每天晚上,各个qq群都会发布各类兼职信息,但他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干什么。

“主要是看工资和工作地点,当然是想要工资高一点的,离自己住的地方近一点的。”小王告诉笔者。

就这样,每天晚上通过浏览qq群里的兼职信息,每天早晨六七点钟起床去地铁口寻找“组织”,成了小王每天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

去年8月,小王在一家少儿英语机构从事招生宣传工作,这是他做过的最长的兼职工作,大概一个月。工作内容主要是向孩子家长介绍少儿英语课程,然后索要对方的电话号码。工作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基本工资90元/天,工作自由灵活,业绩好了每天还有奖金。

收入最多的时候,小王一天赚了120多元钱。每每领到奖金,小王就会买块西瓜,要不就买个鸡腿奖励自己,这对小王来说已经很奢侈了。

收入微薄,除去房租、水电费、电话费、交通、吃喝等生活开支,其实所剩无几。但省吃俭用的小王,每个月还能结余1500多元。

“父母为我盖房子欠了很多债,我必须好好努力,不能让父母太受苦。”小王告诉笔者,房子是父母为他娶媳妇盖的。

说起自己未来的媳妇,小王有些不好意思,“就是我们老家的”。当笔者问她七夕情人节给她买了什么礼物时,小王说:“没买什么礼物,去网吧和她视频聊天了。”

据笔者了解,像小王这样没有固定工作,靠兼职工作谋生的不在少数。在短短一周之内,笔者跟随小王便接触了200余人。他们大多来自河北、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年轻”、“没学历”、“没技能”、“不愿被人管束”是他们身上共同的“标签”。

### 兼职,无奈而又现实的选择

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天桥、地铁口、公园门口,我们总会发现一些“讨厌”的发单员,不管

我们需不需要,他们总会“殷勤”地送过来一份传单。其实,发单员们也讨厌自己的工作。

“感觉一点都不被尊重,有时你面带微笑给人递去一份传单,可别人连一点反应都没有,有的接过传单,顺手就扔了。”所以,我现在很少接发传单的活,除非没有其他活。”孟队告诉笔者,“发传单最怕的不是面对炎炎的烈日,而是别人的冷眼。”

因为经常带人干活,负责联系工作,孟队的工资要比其他人高一点,“但也很累,天天要发兼职信息到很晚,早晨还要起得很早在地地铁口等人。”

“也不是天天能揽到活。”孟队抽了一口烟,氤氲的烟雾在狭小的房间里缓缓上升,“揽到活的话就带人去干,揽不到活只能自己找兼职做。”

孟队的女朋友告诉笔者,每天下班回来,“他鞋也不脱,直接就倒在床上。休息半小时左右才起来吃饭。”对孟队而言,辛苦而劳累的一天结束之后,回到“家”里,躺在床上休息半个钟头,然后再起来吃女朋友做好的饭菜,是他一天之中最幸福的时刻。

孟队和女朋友租住在通州区梨园附近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虽然房间很小,位置偏远,每个月租金要800元左右,但靠近地铁,这已经是他们能租到的最满意的房子了。

孟队总是早出晚归,白天基本上都在外面干活,周末也不例外,“周六周日的活最好,干我们这行的别想着休息。”孟队所说的“活最好”指的是,工作时间相对短,工资还比较高,有时还会有一顿不错的午餐。

孟队告诉笔者,最多的时候,他一个月能赚到5000多元钱,但有时一个月才仅赚2000元。

“如果能找到每月3000元以上的工作,谁还干这种活?不是没本事嘛。”孟队说出了自己的无奈。

但他还是比较满意现在的生活,“做这种活有个好处,你不喜欢领导,你明天就可以走人。但是如果你做长工,你受气了,你也得忍着。”

### 高柱

据8月17日本报报道,因开发商屡屡“失信”不兑现“承诺”,四川巴中农民工李佩霖7月18日爬上塔吊后不慎身亡。此事并非个案。8月11日,广西柳州市新柳大道官塘工业园区,一名农民工为向工头讨要1.5万元工钱,爬上15米高的在建厂房;8月8日,为讨要拖欠近4个月的8万多元血汗钱,河北故城县女工头王敏在开发商的办公室割腕自杀,幸及时送医,王敏才捡回了一条命……近日接连不断发生的农民工极端讨薪事件,在刺痛公众神经的同时,也令人追问:在农民工以“命”讨钱时,我们的政府监管竟到哪里去了?

回头看,要说国家没有制定出台如何惩治“恶意欠薪”的法规和法律,这绝对不是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第九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2013年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还发布《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了明确。

## 以命讨薪折射政府监管缺位

然而,这些规定虽然已明确了用人单位在侵害劳动者权益时必须承担的责任,对于劳动者“权利救济”还是显得有些笼统,赋予劳动部门的监督职权,也仅是责令支付劳动报酬、经济补偿、支付赔偿金三种措施,其处理无疑显得手段单一、薄弱而缺乏刚性。

再如,农民工讨薪不成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尽管判决生效后具有强制执行,但程序较为繁琐,历时较长,费用较高,这对于既缺乏经济基础又缺少相关法律知识的农民工来说,执行裁决、判决难,本身就是一大顽疾。正因诸多惩治“恶意欠薪”的法律规不够健全有力,导致企业主误认为欠薪成本低而得不偿失,再而三地拖欠农民工工资。

即便相关法律法规再健全,也少不了各级地方政府的有力执行。成都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8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了《第168号令》,对企业的责任明确了“谁承包、谁负责”和“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实施多年来,该市恶意欠薪行为不仅得到了极大遏制,而且全市至今未再发生极端讨薪事件。

有效监管“恶意欠薪”行为,并依法予以惩治,是各级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应纳入业绩考核目标,否则,在为农民工维权讨薪问题上难免会出现“地方保护”倾向,并客观上起到“纵容”欠薪的作用。四川巴中市政府农民工维权中心副主任王晓荣在赶赴山东泰安为爬塔吊讨薪死亡的李佩霖讨还公道而义正词严说理时,对方一位领导大感意外地说:“我怀疑你是不是政府的人?”言下之意,似乎为农民工维权并不是政府应尽的职责和本分。

总而言之,要避免上述悲剧的再度发生,在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而使其“权利救济”更有刚性和力度的基础上,各级政府切实发挥好监管执行的作用才是重中之重。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旭 记者顾威)沈阳市总工会近日就全市上半年用工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频繁跳槽致八成用人单位长年招工。那农民工为什么频频跳槽呢?记者日前在农民工求职最集中的沈阳鲁园劳动力市场采访数十名农民工后发现,农民工频频跳槽主要有五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农民工期望值与老板实际给付发生矛盾。“物价涨了,城里人工资也涨了,为什么我们不涨”,“干多长时间也不给涨工资,谁爱长干啊”,“同村人挣的钱都比我多,不跳咋办啊”……听说记者了解农民工跳槽原因,几十个农民工围过来,七嘴八舌诉说着理由,记者了解到,农民工同乡经常聚在一起谈论工资一事,互相攀比,一旦觉得自己工资不如人,也不管自己技能水平如何就跳槽,总希望找到一个收入更高的职业。

第二个原因,工作不顺心。32岁的范师

傅曾是一家骨头馆的厨师,因不满老板责骂而辞职,“不就是周末客人多,酱骨头酱少了嘛,当着那么多服务员的面数落我,这气我能受吗?”提起跳槽原因,范师傅仍是一脸气愤。据了解,好多农民工长期在农村养成的习惯与职业要求不符,老板不满意往往批评斥责,而农民工往往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是认为老板故意挑剔,瞧不起农民工,愤而离职。来自吉林四平农村的46岁保洁员张淑芬说:“在

俺们农村,地、墙壁、门、玻璃擦一遍能坚持好多天,可老板非让天天擦,擦不好就罚钱。”一些农民工也承认,干的活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老板多数不把他们当回事儿。不受重视也使这些农民工的积极性受挫。

第三个原因,希望尝试多种职业。今年24岁的农民工张军干过餐馆打杂、KTV服务员、销售、力工等多个工作,平均几个月就换一个工作,他告诉记者,希望多尝试一些职业,最

后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后就不动动了。张军说,好多人跳槽是被迫的,他是故意的。据了解,这是很多青年农民工频频跳槽原因之一。

第四个原因,一些单位的工作性质让农民工看不到希望,频频跳槽的农民工多数没有什么技能,他们打工的地方也只能选择餐饮服务、商业门店、小超市等不需要什么技能的地方。这些地方多数工资较低,工资增长速度慢或不增,农民工当然不想长干。

## 《工人日报》改变了职工们的持股理念

张润礼

对于《工人日报》,我总怀有一种感激之情,依恋之情,因为她不但改变了我的入生轨迹,也改变了我在工厂职工的持股理念。

1998年,我所在的工厂山西省原平市焦化有限责任公司,面临焦炭产品滞销、债台高筑、运作资金严重匮乏等问题。在企业处于倒闭边缘之际,公司总经理响应国家改革精神,在我们公司内部实行企业改制,当时近千名职工中有600多名职工入了股,尽管每股2000元不算多,但是许多收入低、家庭负担重的职工为了企业的兴旺和发展,还是走亲访友、四处借钱认购了股金。可是,改制后5年过去了,持股的职工想不通的是没有感到一点入股的好处。企业太深了,认购了股金与未持股职工没什么两样,可是企业效益不佳,职工们连工资也难以拿到,股份红利更无从谈起,所以许多持股职工认为认购的股金是打水漂了,总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一时间,我们公司处于一种人心不定、不和谐氛围中,给企业的安全稳定运行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在此情况下,我想到了《工人日报》,就企业持股职工目前的现状,以《持股职工为何没利益?》为题向贵报投了稿。2003年1月30日,我的这篇文章在《工人日报》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文中分析了持股职工没利益的主要原因是与企业领导的自身行为和用人机制有相当大的关系:一是表现为这些企业领导无视广大职工赋予自己的权力,在工作中不是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勤政为民、求真务实,而是致力于权钱交易、弄虚作假,致使企业资产闲置,生产经营举步维艰。二是表现为用人机制不佳。这些改制企业实行的不是任人唯贤、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用人机制,而是大搞“近亲繁殖”、“关系繁殖”,以致学有专长者难以发挥所长。笔者呼吁建立健全企业规章制度,大力规范企业领导的经营管理行为,弘扬勤政廉洁、公而忘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建立良好的用人机制,积累人力资本,凝聚人心,营造人人奋进的工作氛围,才能让企业走出困境。尤其重要的是文章最后编辑老师设计的“相关链接”从职工持股制度、持股职工必须确立的理念、搞好企业股份制先决条件的三个方面详细地解释并回答了持股职工所关心的问题,对我文章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解答。

当天,总经理在看《工人日报》时,无意间发现了我写的这篇文章,便让秘书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总经理说:“没想到咱们公司里还有你这样的人才,小张,你明天就不要在车间里干活了,你来总经办搞文件整理工作吧。”第二天,我就离开车间到总经办任职了。过了几天,总经理在职工大会上还表扬了我,并号召全体员工认真学习我写的那篇文章及编辑老师的“相关链接”,真正理解企业改制和职工持股的内涵,化消极思想为工作动力,开拓创新,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为企业扭亏为盈尽心竭力贡献一切。

从此,全公司职工对企业改制职工认购股金利益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理念,大家在工作中掀起了“比学赶超”热潮,各个车间的工人们爱岗敬业,遵章守纪,踏实肯干,无私奉献,公司效益也打了翻身仗。不仅如此,当年11月,总经理还被例宣布,从第二年起,《工人日报》每年都要订一份,并必须每日更换在阅报栏中,一定要让每个职工每天都及时看到《工人日报》。